

w e s t e r n

文化大转型：  
批判与解释

——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

下

单世联◎著

c u l t u r 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化大转型：  
批判与解释

——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

下

单世联◎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  
(批准号: 10BZX078)的最终成果。

# 目 录

(下)

第十四章 文化产业的社会分析 .....	1233
一 “大众社会”论述中的“大众文化” .....	1234
二 “公共领域”转型中的文化工业 .....	1261
三 “后现代”的文化产业 .....	1286
第十五章 文化产业的欲望机制 .....	1310
一 资本主义与欲望分配 .....	1311
二 文明压抑与文艺释放 .....	1336
三 欲望在符号之外 .....	1357
四 欲望的生产与被生产 .....	1375



第十六章 文化产业的文化效果（上） .....	1397
一 艺术作为“文化” .....	1397
二 “先锋”作为商品 .....	1422
三 艺术家作为“创意阶层” .....	1448
第十七章 文化产业的文化效果（下） .....	1464
一 “图像转向”后的视觉文化 .....	1465
二 “身体”的再现与再造 .....	1488
三 “空间生产”与“地方”重建 .....	1516
四 文化物质化与“物质文化” .....	1542

#### 第四部分 思维风格

第十八章 文化产业研究的学科 .....	1579
一 经济学，还是“文化研究” .....	1580
二 “政治”，还是学术 .....	1603
三 “后学科”，还是跨学科 .....	1622
第十九章 文化产业批判的根据 .....	1640
一 作为“肯定的文化” .....	1641
二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上） .....	1662
三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下） .....	1684
四 作为权力的文化 .....	1723
第二十章 文化产业理论的反思 .....	1762
一 为什么要批判文化产业 .....	1763



二	为什么要批判市场/资本主义 .....	1787
三	批判解释与被批判激活的解释 .....	1813
结语	展望一种文化伦理 .....	1839
一	文化价值及其效益冲突 .....	1841
二	以自由求价值 .....	1861
三	“非人”的挑战 .....	1895
四	中国文化伦理要件 .....	1913
主要参考书目	.....	1929
后 记	.....	1934

## 第十四章

# 文化产业的社会分析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产业是一系列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美国学者斯考特（Allen J. Scott）将文化的社会解释总结为四个要点。（1）在实践和政治生活条件下，我们能够确定的艺术和科学规划的可行主题是什么。（2）艺术的或科学的工作总是在它们发生的背景中被塑造。在此塑造过程中最重大的一个变量就是文化生产中的劳动分工。（3）基于交流的目的，艺术和科学都有其内在的规范、方法、语言等，因而如果从业者与观众联系在一起，他们就不得不共同经历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化过程。（4）艺术和科学的消费群体（即市场）对艺术科学生产者构思和呈现他们的最终作品起着一定的作用。在文化生产受到中介（如代理商、编辑或画廊老板）影响的地方，更是如此。这四个要点强调的是，文化经济不过是人类文化生产的另一种方式，现代文化经济产品与其社会生产条件有



着确定无疑的关系。<sup>①</sup> 研究这类问题，可以形成一种文化产业的社会学。不过，在当代文化理论中，真正对文化和文化产业提出全局性、独创性解释的，不是一般所说的社会学或文化社会学，而是综合了哲学、社会学、美学与心理学等多学科内容和方法的“社会理论”。如果不着眼于文化产业的经济意义，那么文化产业理论也是社会理论——社会科学的一个论域，虽然它不一定都直接使用“文化产业”这个概念。

### 一 “大众社会”论述中的“大众文化”

在1975年重新思考文化产业时，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指出：“‘文化工业’这个术语，可能是霍克海默和我于194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第一次使用的。在草稿中，我们说的是‘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之所以用‘文化工业’代替它，是为了从一开始就与那些‘大众文化’的宣讲者区别开来。根据这些人的观点，‘大众文化’仿佛是从大众本身自发地产生出来的，是流行艺术的当代形式。”<sup>②</sup> 阿多诺等人所说的“文化工业”，是指由商业机构和政治权力强加给“大众”的文化商品，他们在草稿中使用“大众文化”而后改为“文化工业”，正说明这两个概念的相关性。阿多诺此论确实敏感，“大众文化的宣讲者”中的多数，都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与“精英文化”相对的概念，是由“大众”自发生生产的产品；阿多诺或许过于敏感，因为那些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

<sup>①</sup> 参见[美]阿伦·斯考特《文化经济：地理分布与创造性领域》，曹荣湘译，薛晓源等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sup>②</sup> Theodor W Adorno, "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 in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ed. J. M. Bernd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 98.





自发地生产出来的论者，也并不认为“大众文化”具有正面的文化价值。从根本上说，“大众文化”一开始就是批判性的概念。

在文化史上，由于文化长期由少数精英所掌握甚至垄断，因此“大众”或“群众”的形象甚为不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早就意识到所谓“多数人暴政”问题。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在其伟大的剧作中借人物之口说道：“群众就像漂浮在水上的菖蒲，随着潮流的方向而进退，在盲目的行动之中湮灭腐烂。”<sup>①</sup> 在18世纪启蒙领袖狄德罗（Denis Diderot）为《百科全书》所写的条目中，“大众”（Multitude）是作为哲人的对立面出现的：大众受基督教传统的束缚，没有参与到推动人类精神进步的启蒙事业之中。启蒙哲人“怀疑大众在推理和哲学问题上的判断；他们的声音是邪恶、愚蠢、残暴、不理性且充满偏见的……大众是无知且浑浑噩噩的……在道德问题上怀疑他们；他们不能采取强有力而慷慨的行动……在他们眼里，英雄主义几乎是愚蠢的”<sup>②</sup>。法国大革命第一次显示了“大众”的力量，却是与雅各宾党人的暴力和恐怖联系在一起。德国诗人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这样描述说：“在为数较多的低等级的人群中，我们见到粗野的、不爱法律制约的内在驱动力，它在市民秩序解体之后迸发出来，往前狂奔，去满足其兽性。”<sup>③</sup> 席勒的朋友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也以为：“没有什么比多数更讨厌的了，因为它是少数有力的首领、一些随机应变的骗子、被同化的弱者，以及尾随在他

① [英] 莎士比亚：《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莎士比亚全集》（10），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1页。

② [法] 狄德罗：《大众》，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2008），齐安儒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9—90页。

③ [德] 席勒：《人的美学教育书简》（1793），《席勒文集 VI》，张佳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页。



们后面的、完全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人群所组成的。”<sup>①</sup>对“大众”（平民）的这种反感、厌恶和责难存在于从古到今的西方论述之中。艺术家的敌人，既有政治权力，也有庸俗公众。19世纪的法国作曲家伯辽兹（Hector Louis Berlioz）就在其回忆录中如此讽刺“大众”：

好人们呀，你们的嬉戏真是感人！你们的娱乐方式真是可爱！在你们的游戏中充满了多少诗意！在你们的喜悦中充满了多少崇高和优雅！哦！是的，伟大的评论家们很有道理，他们说艺术是为普通人而诞生的。如果说拉斐尔能画出神圣的圣母像，这是因为他了解人民对美好、圣洁、纯净的理想的热爱；如果说米开朗琪罗可以从大理石中雕出他那不朽的摩西像，如果说他那充满力量的双手能够建立起一座奇妙无比的教堂，这无疑是为了回应那震撼人们心灵的伟大激情，是为了让那使他们刻骨铭心的、受到托夸多·塔索和但丁所热情颂扬的诗的火焰更加熊熊燃烧！应该诅咒所有那些不受大众欢迎的作品！因为如果大众蔑视它们，那一定是它们毫无价值；如果公众轻视它们，那一定是它们本来就让人鄙视；如果公众用口哨声来谴责它们，谴责作者，那一定是他本来就缺少对公众的尊敬；他竟胆敢凌辱公众伟大的聪明才智，触犯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自尊。那好吧，就让他滚吧，见鬼去吧！<sup>②</sup>

<sup>①</sup> [德]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18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65页。按：这句话出自歌德晚年的格言，参见程代熙等译歌德《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页。中国传统的雅/俗之分，也与此相似。如宋代朱熹诗云：“裴侯爱画老成癖，岁晚倦游家四壁。随身只有万叠山，秘不示人私自惜。俗人数看亦不识，我独摩挲三太息。”（《题祝生画》）

<sup>②</sup> [法] 艾克托尔·路易·伯辽兹：《伯辽兹回忆录》（1870），佟心平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189页。引文中的托夸多·塔索（Tasso, 1544—1594）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的诗人。



但“大众”在崛起。随着两次工业革命而来的工业生产新模式、民主化、城市化、妇女就业、工人运动、大众消费、大众休闲、义务教育等，都日益深刻地解构了欧洲传统的“阶级社会”。其中最重要的是识字的普及、工业革命与城市化三个因素：

识字普及——这是政治觉醒的关键手段。处于启蒙状态的群众识字后，通过小册子就能接受简单的政治观念、口号和概念。“在此以前主要是白纸一张的群众心灵突然听到似乎很动听的概念，目前的不平等不是可以逆来顺受的上帝的行为，而是罪恶昭彰的不公正。个人（典型地指农民）过去只不过是永恒不变的等级制度中的末流鼠辈，而现在拥有集体人格、权利和抱负的人民或民族的成员。更重要的是，被剥削的工人不只是前城市农民，而是历史决定的拯救人类的革命阶级的成员。识字的普及使传播政治思想成为可能。但是，这也意味着政治思想不得不通过意识形态和宣传变成简单的观念。”<sup>①</sup>

工业革命——识字的普及是工业革命的副产品。此外，工业革命还通过急剧打乱社会环境促进了公众的政治觉醒。

城市化——这种大规模的转变所带来的唯一后果是，废除了民众既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突然间摆脱传统乡村生活的农民集中在城市里，就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桀骜不驯的社会阶级。这个新的城市群众往往在政治上失去方向，因而很容易接受简单的政治号召。他们渴求——的确，他们需要——对他们所处的令人困惑和往往是严酷的环境能作出某些令人信服的解释。由于宗教已不再能满足这一要求，于是政治就乘虚而入。”<sup>②</sup>

①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1993），《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页。

② 同上书，第30—31页。



所以，尽管社会分层一直存在，但“大众”却是现代性的后果，“大众理论”也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19世纪的零散论述构成其古典传统，20世纪的系统研究则形成其完整理论。

19世纪初，旧制度的看守者、“欧洲宰相”梅特涅公爵（Klemens Metternich）忧心忡忡地说：“经过深刻的考虑，我认识到旧的欧洲在开始走向终结，另一方面，新的欧洲还在酝酿中；在开端和终结之间将会是一片混乱。”<sup>①</sup> 方生方死之际，一大批学者开始以不同的概念和不同的态度来讨论这巨大的社会转型，而“大众”则成为建构传统/现代论述的概念。它所指称的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社会中，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集中在一起，乡土社会中的礼俗规范、血缘或地缘的交往方式和控制方式已不再有效，取而代之的是契约、规章制度和法律，这就形成了一个无历史的社区和非人格化的社会。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尚武社会”/“工业社会”，英国法学家梅因（Henry Maine）的“身份”/“契约”，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共同体”（Gemeinschaft）/“社会”（Gesellschaft），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等等，都是早期“大众社会”理论的结构框架。比如在迪尔凯姆看来，当传统分隔瓦解、人们开始相互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竞争并不必然导致冲突，而是引向更为复杂的分工体系和不断增加的结构差异时，大众社会就诞生了。“机械团结”是建立在社会中个人的相同和相似性特质的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它发生在不发达的社会中，其时人与人没有分化，整个社会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并以集体湮没个性为代价。“有机团结”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和个人的

---

<sup>①</sup> [英] 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1969），夏威夷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页。



异质性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在高度分工的工业社会中，社会就像一个具有各种器官的有机体一样，其中每个人按照社会的分工执行着某种专门的职能，个人和群体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且这种差异不断发展。总之，社会团结的物质基础是分工，精神基础则是集体意识。机械团结来自相似性，有机团结来自异质性。从原始的、乡村的机械团结到城市的、工业的有机团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分工越细，个人的行动越专门化，个性就越鲜明，个人对社会依赖就越深，社会整体的统一性也就越大，因此“有机团结”的出现使得根深蒂固的集体意识瓦解了，或者说只有微弱的集体意识。

作为对正在来临的新社会的解释，迪尔凯姆等人一般没有明确的褒贬态度。但更多哲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们，则并不欢迎新社会。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de Toqueville）、法国小说家司汤达（Stendhal）、英国哲学家穆勒（James Mill）、德国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德国文化史家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瑞典戏剧家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等都对开始走上社会与文化舞台的“大众”忧心忡忡，他们的态度代表了传统精英的普遍立场。古典的价值因当代的混乱而彰显。烟雾笼罩、拥挤肮脏的城市环境，日益复杂且不稳定的社会生活，满心在丈量天地、计算利益得失的市侩习气，迷信人能改天换地、制造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并创造人类历史的乌托邦思想，等等，在布克哈特看来，都是文化衰落的征兆。他对古典的深情留恋，正是由悠久伟大的传统所养育的。1904年，德国思想家韦伯美圣路易发表演讲，特别比较欧洲和美国知识分子的不同态度：“在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度里，‘受过教育的贵族’（或者如他们愿意被称为的那样：教养贵族）……总是用更为怀疑的目光看待资本主义的胜利推进，对它



的批判也总是更为尖锐，尤其是与美国那里自然地、正当地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相比。一旦智识教育与审美教育成为一种职业，它们的代言人，必然会与所有古代文化的担纲者之间，发展出一种内在的亲有关系。”“文化最高利益的代表者们……站在资本主义之不可避免的发展之对立面，拒绝就塑造未来的结构进行合作。”<sup>①</sup>

与此同时，还有一种基于民主立场的批判。19世纪的法国，政府像走马灯一般地频频更迭。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目睹一些政客如路易·波拿巴（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和布朗热（Georges Ernest Boulanger）是如何巧妙地利用民众情绪使自己成为偶像，而法国大众又是如何轻信、易变和健忘的过程，勒庞受迪尔凯姆的启示，认为众多的个人合在一个集体中，会产生一种临时性的“集体心”（collective mind），这种心理具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并遵循特殊的行动法则。因此，仅仅大量个人聚集在一起并不足以构成一个群体，它是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组成群体的个人已不再是他自己，而是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所以，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形成群体的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全看它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群体可以是犯罪群体，也可能是英雄的群体。无论如何，它的心理特征都是与冲动、易变、急躁、轻信、夸张、单纯而走极端、偏执、专横和保守等联系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是高度的“受暗示性”（suggestibility），其结果是产生心理的传染（contagion），如星火燎原

---

<sup>①</sup> 转引自〔德〕弗里茨·林格《韦伯学术思想评传》（2004），马乐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页。



一般，迅速蔓延扩散，引爆所有的情绪与行动。其势力之大，只要身处其中，都无法避免。所以一个人独处时可能会洁身自好，但一旦置身于群众之中，便可能失去自我控制的力量，成为野蛮人。这就决定了“群体”其易受领袖的动员和操纵的特性，利用形象、词语和套话；提供幻觉；诉诸经验并重复经验等都是领袖惯用的动员手段。勒庞认为，由于传统信仰的毁灭和现代科学、工业的各种发现，西方社会正在进入“群体的时代”。个体置身于“群众”之中，仅仅因为他是群体的一分子，便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强有力的感觉，而且因为在群体之中，隐姓埋名，可以不负责任，于是容易将平时所有的约束和控制抛置脑后，为所欲为，不顾后果。而“群众”的崛起，又表明西方文明进入衰败期：“这个不可避免的时刻，总是以作为种族支柱的理想的衰弱为特点。同这种理想的衰弱相对应，在它的激励下建立起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动摇。……个人的个性和智力可以增长，但是这个种族集体的自我意识却会被个人自我意识的过度发展所取代，同时伴随着性格的弱化和行动能力的减少。本来是一个民族、一个联合体、一个整体的人群，最终会变成一群缺乏凝聚力的个人，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仅仅因为传统和制度而被人为地聚集在一起。正是在这个阶段，被个人利益和愿望搞得四分五裂的人，已失去了治理自己的能力，因此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也需要领导，于是国家和领袖开始发挥引人注目的影响。随着古老理想的消失，这个种族的才华也完全消失了。它仅仅是一群独立的个人，因而回到了自己的原始状态——即一群乌合之众。它既缺乏统一性也没有未来，只有乌合之众那些一时的特性。它的文明现在已经失去了稳定性，只能随波逐流。民众就是至上的权力，野蛮风气盛行。文明也许仍然华丽，因为久远的历史赋予它的外表尚存，其实它已成了一座岌岌可危的大



厦，它没有任何支撑，下次风暴一来，它便会立刻倾覆。”<sup>①</sup> 勒庞之后，以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为经验背景的大众社会理论所强调的正是极权意识形态对大众思想统治的绝对有效性。极权社会的“大众”指的不只是人数众多，而更是众人彼此隔离、相互疏离的状态。极权统治下的大众不断受到政治运动的激励，不断处于动员状态之下，因此而聚合为“群众”，更确切地说，是“革命群众”。极权制度中，合众为群的关键力量是一个力行政治专制的群众政党，它把国家和市民社会合成一体，并以敌我对立（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来统治社会。在极权社会中，没有人敢承认自己游离于公共政治之外，没有人敢公然对政治表示冷漠和怀疑，更不要说对它冷嘲热讽。群众社会不断处在“积极行动命令”之中，并以此形成绝对整体的大众社会。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年》所描绘的正是一幅不容冷漠和怀疑存在的极权社会的图景。

“大众”论述的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理论与文化理论的主题之一。美国社会学家孔豪泽（William Kornhauser）在《大众社会的政治》（1959）中，把欧洲的“大众社会”理论整理为贵族立场的批判与民主立场的批判两个传统。前者认为，由于人口众多的大众登上政治舞台，过去的社会精英所特有的“社会隔离症”从此消失，从而整个社会文化有受到非理性的大众行为的影响而堕落的危机。这就是说，在大众社会中，非理性的一般大众取代有理性的贵族精英而成为都市社会文化的决策者，结果导致现代社会面临的种种病态。后者的观点是，在大众社会中，大众有如傀儡一样容易受到少数精英的控制和操纵，成为专制者或极权者的牺牲品，以至于丧失民

<sup>①</sup> [法]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1895），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





主的本质而生产各种病理现象。孔豪泽认为，前者的危机感来自“大众”接近精英之可能的增加，后者的危机感来自大众之被精英操纵的可能之扩大。两种立场恰恰相反，但对“大众社会”的反感是一致的。<sup>①</sup>

一般认为，最早正视“大众”现象并予以系统分析的，是西班牙思想家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其名著《大众的反叛》是对大众的第一次批判。加塞特指出，19世纪的民主政体、科学技术和工业制度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大众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并且在社会上占据着优越的地位，而在过去——如果它存在的话——它从未被人注意过，它仅仅是社会舞台的背景，一点儿也不起眼。然而，如今它却越过舞台的脚灯，摇身一变成了主角。在社会的舞台上，再也看不到严格意义上的主人公，取而代之的是合唱队。”<sup>②</sup>“大众”（the multitude）是与“少数精英”（minorities）相对的概念，后者是指具有特殊资质的个人或群体，也就是“贵族”，他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自己以重大的使命和责任，前者指没有特殊资质的个体或群众，对自己放任自流，就像水中漂动的浮标，游移不定，随遇而安。“大多数人、群众的形成往往意味着组成群众的个人在欲望、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一致。”“大众人”（a mass-man）是这样一种人：“他从不根据任何特殊的标准——这一标准好坏姑且不论——来评价自己，他只强调自己‘与其他每一个人完全相似’。”<sup>③</sup>所以，“精英”与“大众”之分不是社会阶级的划分而是两种人、两种生活

① 参见宋明顺《大众社会理论——现代社会的结构分析》，（台湾）师大书苑有限公司1988年印行，第5页。

② [西]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1929），刘训练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28页。

③ 同上书，第28、29页。